



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第一集

王曉平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第一集

王曉平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第1集/王曉平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25-5971-8

I. ①國… II. ①王… III. ①中國文學—文學研究—叢刊 IV. ①I206-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25120 號

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第一集

王曉平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韻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0.25 字數 346,0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

ISBN 978-7-5325-5971-8

I·2372 定價:70.00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發 刊 詞

無思想，無學術也；無學術，無大學也。然而思想談何易，學術談何易！

中國文學自立于世界文學之苑，得東西雲水之滋養，吐千年不敗之芬芳；中國文學之研究，則不可無歷史之智慧，不可無天下之眼光。海納百川，以望其大；扎根本土，欲求其深。知東洋西洋，方煉獨立之精神；審秦皇漢武，益愛自由之思想。

學人力微兮，道不可辱；學術爲公兮，術不趨亡。不畛彼土此方，不拘傳統現代，唯真知者尊；不讓宏觀微觀，不拒白話文言，唯有物者享。爲冷冷清清之文獻研究加一分熱，爲人云亦云之闡釋研究降一降溫，爲飄飄悠悠之比較研究增一點分量。不必言巧，不必跟潮；不必位尊，不必名高。有直面癥結、擊破玄機之誠意，無唯上唯俗、借風造勢之矯情。事理不虛，學思相彰。避兩級化、類型化、套語化之陳言，發互讀、共賞、知同、明異之清響。唯求一得，好文章也。

本刊由天津師範大學國際中國文學研究中心主辦，乃學術研究性集刊，旨在中國文學（以古典文學爲中心）之跨文化、跨學科研究，設“國外中國文學文獻研究”、“對外傳播研究”、“對外翻譯研究”、“學術交流史研究”、“國外研究評論”、“世界漢學家研究”、“亞洲漢文學研究”諸欄目，關注中國散佚而存諸國外的文學史料，且適當提供各國研究之最新理論與動向。

文字三十萬，園圃一小方，土爲會通開，門向友生敞。可播新種，可植異花。望耕耘者各有收穫，願觀賞者聞其馨香。

目 錄

發刊詞	1
詩學與文化互讀	
尋求表述“東亞文學”生成歷史的更加真實的觀念	
——關於我的“比較文學研究”課題的思考和追求	嚴紹盪 1
“國語”、“國文學”與民族主義	川本皓嗣(趙 怡 譯) 5
當代詩的創作問題	夏傳才 14
“和解”之路	
——歐洲及東亞的比較	中川謙(劉九令 譯) 24
顧愷之前後	
——《列女傳圖》的系譜	黑田彰(劉九令 譯) 28
論日本小說觀念的近代轉型	
——以《小說神髓》為中心	甘麗娟 39
《苦悶的象徵》的理論闡發與詩學生成	李 强 47
《時務報》與福爾摩斯的中國式亮相	郝 嵐 57
日本近代詩與音樂	
1920年前後的北原白秋與三木露風	平石 典子 (勾艷軍 譯) 70
近代詩的“單句構成”	
——宮澤賢治的韻律論	水野達朗(劉九令 譯) 81
文獻研究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群書治要·詩》略考	王曉平 94

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轉歸江南圖書館始末

——以《藝風老人日記》所見史料爲中心	石 祥	110
蕭穎士晚節考	楊 伯	119

文學學術交流史研究

1921 年芥川龍之介的天津之旅	姚 紅	132
異域知音:豐子愷與夏目漱石	黎躍進 王 希	146
中島敦文學中的中國表像	郭 勇	154
關於戰爭敘述差異的成因		
——中國建國初期戰爭小說與日本戰後戰爭小說比較研究	王廣生	165
1926 年胡適遊歐之行中與伯希和、衛禮賢的交遊	葉 雋	174
魯迅與鹽谷溫的學術因緣與歧見		
——以中國小說史研究爲中心	鮑國華	182
蘇聯中國學——文學研究的發展階段與歷史特點	李逸津	193
試論烏山喜一歷史觀中的理性主義特徵	郝 蕊	202

亞洲漢文學研究

朝鮮半島中國學年表	劉順利	218
日本學者關於《論語》源流的考察	張士傑	229
《箕雅》詩人名字漢義解詁	劉 暢 趙 季	241
日本詩話的民族性、啟蒙性及集團性特徵		
——以池田四郎次郎《日本詩話叢書》爲中心	祁曉明	290

外譯研究

理雅各的《詩經》翻譯(一)	吳伏生	306
編 後		318

尋求表述“東亞文學” 生成歷史的更加真實的觀念

——關於我的“比較文學研究”課題的思考和追求

嚴紹璽

本文將表述我有關“東亞比較文學”研究的思考和設定的學術目標，並向各位請教，同時也是向川本皓嗣先生的一次回報——他的學術對我具有長期的影響。

40 多年前，我開始觸摸國際“Sinology”，30 年前更以較大的精力從事“日本中國學”的研究，由此起始，我便注目於“東亞文化關係”，又從寬泛的“文化關係”的興趣中專注“東亞文學關係”的研討。我的目的是希望通過這些“關係”的研討，從中獲得關於“東亞文化”或“東亞文學”傳遞的某些“學術圖譜”，從而成為闡述“日本中國學”的具有確定性的“真實的語境”。不意一旦進入這些領域，就把自己置於“比較文學”的研究之中，而我最感興趣的則是在於追求更加“真實地”表述“東亞文學”生成的歷史。

在許多先輩和學界同仁的指點下，我接受並逐步地深化了對於“比較文學”觀念的體認。當我從文學的“發生學”、“傳播學”和“闡釋學”等多層面的立場上考察學術界關於“東亞文學”生成歷史的表述後，便日益感覺到目前所讀到的國內外關於這個層面的研討，不少論說還是過多地局限在“民族文化自閉”的文化語境中，以自己本民族文學的所謂“統一性”、“單一性”和“穩定化”及“凝固化”為自身的“民族性特徵”，從而事實上隔斷了“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化的豐富多彩和千絲萬縷的聯繫，把本來是由多元組合的民族文化與文明的發展，偽裝成七零八碎的所謂具有“單一性”和“凝固化”的“愈是民族的便愈是具有世界性”的。比較文學學術提供了一種從“跨文化”的立場來觀察文學和文化的視角。一旦把此種“跨文化”的立場變成自己的學術觀念和方法論的基礎，我便發覺自己對從前所擁有的關於“中國文學”和“東亞文學”的各種知識，產生了不少“躁動不安”的情緒，即時常懷疑自己已經獲得的“知識”的“真實性價值”。這種“懷疑”和“自省”最早是從研究日本古代文學開始的。當“比較文學”的研究正在相關的文學領域中解構“純粹民族文學特性”，以復原文明世界中的文學樣式事實上具有層次不

等的“多元文化構造”的時候,我便開始把認識日本文學最初始的經典樣式應該具有的內在多元發生與構造機制,作為自己的課題,着手揭示和闡述這些機制的材料組成和表述的邏輯特徵。

我自己以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假如我們能夠在這個課題中有所收穫,我們或許可以找到一個重新認識更加接近于真實“東亞文學”歷史的有意義的入口。

30年來,我設定自己應該在兩個層面上展開這一課題的研討。一個層面是沿着關於日本“記紀神話”作為“神話變異體”的本體論內容,不斷地在多層面中搜索材料,細讀文獻,進行可能的田野調查,從而提升自己的思考,並從中確立相關的課題。另一個層面是以“記紀神話”的研討作為起始,把思考與表述對象擴展到對構成日本上古文學基本線索的相關的“經典文本”的生成機制中,採用在“記紀神話”研討中積累的命題與解題的經驗,在較為宏觀的層面上,希望構成既能更加接近“文學”在寬廣的“跨文化文明史”中生成的真實狀態,又具有研究者學術個性的揭示日本上古文學生成本源的一種邏輯解析系統。

由於我的學術構想已經介入東亞文學的許多部位,面臨已有的學術觀念的重大挑戰,這種挑戰本身也具有“跨文化”性質。我想,既然我設定以“日本上古文學”為對象來體驗“比較文學”學術的價值和意義,那麼,作為一個中國學者就應該把這些研究課題做到對象國的學術界去。

在第一個層面上,我以《古事記》、《日本書紀》和《風土記》為基本文本,確立了一些課題。比如《神話の文化の意義について》、《日本神話の構成について》、《「記紀神話」に現われた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人種と文化との移動について》、《記紀神話における二神創世の形態》、《東アジア創世神話における「配偶神」神話成立時期の研究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の神々における中国漢民族の「神」の概念について》、《「古事記」における疑問の解読——「天の柱」と「廻った方向」と「ヒルコ」との文化意義について》等,都是關於“記紀神話變異體”本體論的闡發,基本構成了一個系列。

在第二個層面上,與“記紀神話變異體”本體論的闡發相呼應,確定把構成上古時期日本假名文學兩大文學樣式——“散文文學”與“韻文文學”——中的《萬葉集》、《浦島子傳》、《竹取物語》、《源氏物語》這四部被廣泛認定的“文學經典”作為範本,探討其“文學本源”,並闡述其“經典”形成的軌跡。其中,對《萬葉集》設定的課題在於研討作為“和歌”音律的“三十一音”形成的本源;對《浦島子傳》設定的課題是由多種文本演進所體現的從神話敘事到初始古物語敘事的軌跡研究;對《竹取物語》設定的課題是文本

透露的文化視閥、《物語》假名文本的前驅“漢文文本”或“准漢文文本”的可能性研究；對《源氏物語》設定的課題是中國漢民族文學在日本的變異與《物語》情節、意象的關係研究。這些課題的完成都包含着很艱難的文本細讀和在廣泛的文化史圖譜上的文本解析歷程。

在上述兩方面的課題深入的同時，我意識到，現在是在“文學關係”的傳統框架中推進自己的研討，而研究的結果是以“中日文學關係”或“東亞文學關係”的概念展現的，它與“國別文學”和“民族文學”的研究仍然是兩張皮。一百多年前當先輩學者創設這一學術的時候，他們是苦於在“民族文學”或“國別文學”的範疇內遇到了只有“超越”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文化範疇才能解決的難題，因而從“民族文學”和“國別文學”的概念中獨立出了以“雙邊”或“多邊”文學研究為基礎的“比較文學”這一新的學術。一個世紀以來，“國別文學”研究一直與“比較文學”研究相對峙，並且常常使“比較文學”的學術“陌生化”。但是，隨着比較文學研究的發展，即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並由此而提升學理，它不僅已經認識到“純粹民族文學”或“純粹國別文學”阻斷了表述“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化聯繫的事實及其嚴重的後果，而且，也多少摸索到了回答上述難題的某些學術層面，這樣，我以為現在我們已可多少有把握地提出“把比較文學做到民族文學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學的研究中拓展比較文學的空間”這樣一個理念。假如我們真的能夠做到這一步，那麼我覺得，這將是比較文學學術特別是我們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可能獲得的最有價值的學術成果之一。

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已經有近十年了。1998年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邀請，參加了“新世紀文學研究名家論壇”，並嘗試着以“中國文學研究必須樹立國際文化意識”為主題第一次提出，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應該高度重視“比較文學”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者自身應該有“比較文學”觀念的自覺意識。這個設想不意受到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熱烈回應和贊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1999年第1期又將我的論稿作為首論文章發表公刊。在北京大學東語系為紀念北大一百周年舉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又以“日本文學研究中的比較文學之可能”為題做了主題報告，我愈益意識到在“國別文學”研究中引入“比較文學”，既是有可能的也是必須的。於是，我對“如何把比較文學做到民族文學或國別文學中去”作為“雙邊文學研究”或“多邊文學研究”必然的學術延伸，給以了足夠的思考。2003年，我在首屆“北京論壇”上，以《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編纂中存在的文學觀念的“單一性”和“封閉性”為靶的，以國際比較文學界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成果為事實基礎，再次試圖把“比較文學”的觀念和成果植入中

國文學研究界。後來,應陳思和教授之邀,遂在復旦大學“陳望道講座”上再次發揮這一主題。2005年“全國蒙古學學術大會”在京召開,我就“蒙古文學研究中如何做比較文學”這一主題發表講話。2005年《中國比較文學》第三期以“民族文學研究中的比較文學空間”為題發表了我幾年來對這一問題綜合思考而成的論說,《新華文摘》轉發了全文。至此,對於如何把“比較文學”的“發生學”、“傳播學”和“闡釋學”做到“國別文學”和“民族文學”中去,我也有了基本成型的想法了。學術界如果真正實現這一學術追求,文學研究極有可能會有“新質”的產生。這就是說,“比較文學”研究者的手中,真正握有“重寫國別文學史”的旗幟。學術界大凡碰到“拔旗”和“插旗”的爭論,背後總是隱藏着“窮凶極惡”甚至“你死我活”,這大可不必。我自己目前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所從事的課題,就是以文明史的事實為基礎,再次檢驗並推進近30年來在對日本上古文學的以“發生學”為中心的研究,在學術的更高的層次上從“分離”走向“重合”。我並不是要刻意提出“重寫文學史”,但“比較文學研究”的邏輯把研究推到了這樣的層面上,實非本意,勢之然也。

2008年,國家教育部同意把“東亞文學的發生學研究”作為重大課題。通過這一課題,我們試圖在日本、朝鮮、越南古代文學領域中,同時運用“發生學”的觀念與基本模式,闡述東亞文學的生成過程。這一課題,並不僅僅屬於我個人,一直以來,我都有這樣一個想法:只要“比較文學”研究能夠獲得愈來愈多的有價值的成果,就一定會有更多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和“國別文學研究者”,在“真實學術”即“科學學術”的旗幟下,幾代人一起來實踐這一個很有意義的學術課題。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北大人文學部委員、中文學科學術委員會主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國家宋慶齡基金會日本學研究獎勵基金專家委員會主任,日本山片蟠桃獎獲得者)

“國語”、“國文學”與民族主義

川本皓嗣(趙 怡 譯)



在日本的教育研究界，有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那就是很長時間裏不將日語稱作日語，而稱之為“國語”，日本文學也不叫日本文學，而稱之為“國文學”（雖然最近多少有了一點變化）。

李研淑就這個特別的專門術語的歷史和含義，曾經在《“國語”之思想》（1996）一書中做過精闢的分析。不過我認為，這兩個專有名詞只出現在教育研究的場合，比如學校的課程名稱，或者大學等機構裏的研究領域的名稱之類，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因為一般情況下，即使在日本，相對於“世界文學全集”的是“日本文學全集”，現在已經沒有人將其稱之為“國文學全集”。而且日常會話中，和英語、法語相對的，一般也是日語這個稱呼。除了學校的教育課程之外，幾乎不會使用“國語”這個辭彙。但是“國語辭典”即便到現在也是一個占絕對優勢的說法，只有面向外國人的詞典才會命名為《日語辭典》，不過這也還是包含在教育範圍裏的一個例子。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明治以來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的當事者們，特別強調使用這兩個有着濃厚的民族主義味道的辭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謂當然之舉。因為語言與文學，原本就是牢牢支撐民族主義的兩個支柱，而民族主義，又是建立近代國家所不可或缺的思想體系。

根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1983）的理論，所謂“國民”，就是基於“歷史的宿命性”和“語言”，在人們的腦海裏“想像出來的共同體”（安德森，第239頁）。而所謂“歷史的宿命性”，則是指由“皮膚的顏色、性別、出身和出生的時代——這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切”所

派生出來的“自然的紐帶”(第236頁)。正是意識到了這種宿命性,人們才會“心甘情願地爲了自己的祖國奉獻出生命,即便這個祖國並不是他自己所選擇的”(第237頁)。另一方面,後者的“語言”,則是相對於昔日支撐“偉大的古典共同體”的“神聖語言”(如拉丁語、巴厘古文、阿拉伯古文和中國的古文)(第36頁)^①的,被資本主義出版業加以標準化,並得到廣泛普及的當地俗語(vernaculars)(比如在當地日常生活所使用的法語、英語、西班牙語之類)(第84—85頁)。當然不用說這種當地俗語本身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的宿命性”。因爲它“不管出自怎樣的歷史緣由,總而言之成了他或者她的母語”,因此每個人“從呱呱落地到被送進墳墓,一直都是通過這種語言回顧過去,想像友情,並夢想未來”(第250頁)的。

正如李研淑通過其精到的論證所證實的那樣,明治日本在來自西方世界的強大的外壓之下,爲了建立一個統一的近代國家,硬是想創造出一種“標準語”(相當於中國的普通話),一種當時在日本任何地方都根本不存在的架空的語言。“標準語”的基礎是住在首都東京的中上流社會階層所使用的日常用語,這種語言被施以某種人爲的加工,然後通過教科書教授給全國的學生,同時教室裏則嚴禁使用各地方言,從而達到抹殺各地方言的目的。當時一些小學裏,如果有孩子不小心說了方言,會被強行在脖子上套上寫有“方言牌”的木牌,中國“文革”中給人掛牌子,說不定就源出于此。正如爲了建立文明國家,大建西洋式的鹿鳴館,大辦洋式舞會一樣,建立一種速成的標準日語,並迅速推廣到全國的做法,在當時也實在是一種不得不爲的歷史的必然。

因此我們可以說,“國語”這個辭彙,實際上就是將這種民族主義的意圖,一不小心完全暴露出來了的稱呼。比如法國將法語稱之爲“français”,將法國文學稱之爲“littérature française”,初看上去顯得十分客觀,但其內涵絕對不是無色透明的語言文學的分類名稱,這其中暗含着以理性、洗練和高度的人性爲世界之翹楚的祖國法蘭西的“國語”(langue nationale)和“國文學”(littérature nationale)的語音和內涵。實際上“法蘭西”這個稱呼本身,就是法國人的驕傲。

而德語,即 Germanistik 這個辭彙,內包着德意志和日爾曼民族所固有的語言與文學這雙重意思,更加強烈地散發着民族主義的氣息。因此語言與文學,都是爲了在構造上

① 但是安德森將古拉丁語、阿拉伯古典語和中國的古文統統歸入“神聖語言”,認爲它們“不是用聲音,而是用(仿佛數學語言般的)記號創造了共同體”(安德森,第36頁),這種看法值得商榷。確實這些語言在各地都有不同的語音,但是拉丁字母僅僅是模寫語音,(至於德裏達所說的語音語言和書面語言究竟哪個是“第一義的”這個問題暫且別論),而“漢文”則從一開始就作爲“書面語言”得到了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比拉丁語更大大接近數學語言。

保證近代國家的統一性和對外形象的,不管它具有什麼稱呼,這個根本的性質都不會改變。但是在日本當局吞併朝鮮的時代,僅僅出于一種自閉的、鈍感的自我滿足,就將自己的“國語”和“國文學”強加給朝鮮民族,引起他們強烈的反感。這種做法實在是既愚蠢又殘酷。

不過我覺得,民族主義既有着面對自己國家的土地與固有的價值取向時所自然形成的感情與自豪的一面,同時還有更強烈的另一面,那就是對映入他人眼裏的自我形象的強烈意識,那種非常想讓自己在別人眼裏顯得更好、更風光的欲望。而且因為民族主義原本就來自于重視個性和特性的歐洲浪漫主義思潮,因此就會更加要求在這種對外的自我形象裏,具備有別于其他民族的別具一格的特性與卓越性,具有不混雜外來要素的純粹性,具有能夠追溯到遙遠的民族起源上去的本質上的一貫性等等因素。當然這些形象,不用說,也起到了國民內部之統一的象徵作用。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這種對內發生效果的形象,實際上也是基于對外的“顯擺”,基于外表的張揚。

其實當一個國家對外顯示自己的卓越性與獨特性的時候,通常文學比語言更起作用。因為在民族主義對外形成自身形象時,是通過文學,而不是語言來形成其具體的內容甚至其骨架。究其原因,是因為無論從常識上還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語言本身都沒有美醜優劣之分,尤其在強調本國比他國優越時,拿本國語言的優秀性作為根據好像比較困難。當然也有像法國那樣,將其語言本身作為一種值得向他人炫耀的資產,但是法語中所具有的各種特性,實際上在很多場合,都不過只是反映了用法語寫出來的文學所具有的性質。因此語言在民族主義中所起到的作用,就與文學不同,只是一種防衛性質的,也就是說,有了其固有的語言,在面對外來壓力時,就能將自己國家的存在理由正當化。

民族主義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能動的、膨脹性的,而另一種是被動的,防衛性的。但是不管在哪種場合,文學在形成其對外形象中都能起到極大的作用。

比如十九世紀的英國,就是依靠文學來準確地描述出它所具有的出色的工業力量和軍事力量,走在文明最先端的極高的基督教的道德水準,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所特有的堅忍不拔的精神,以及牢不可破的社會“良知”。將這種西歐其他各國所罕見的,有着豐富巧妙的語言藝術,和十分重視社會與道德、重視文學對人生之影響的,獨特的傳統的文學形象,向國內外彰顯,以此增強國民的凝聚力,並且最終以這種卓越的文學的名義,將自己的殖民統治正當化。也就是說,文學本身提供了由它所象徵的,高度文明必須教育、開導無知黑暗的落後民族這樣一個“使命”,或者說是藉口。

從膨脹性的民族主義這個角度來說,國內外的文學教育,不僅關係到普遍的“教養”或者“審美情操”,而且包含着強烈的意識形態上的、政治性的任務。在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通過教科書傳授英國文學名作,自然會將孕育出如此偉大文學的英國這個國家的形象也一併教給當地人民,並讓他們為自己也能分享這個偉大國家的文化而感到高興。

同樣對法國的殖民主義來說,情況也毫無二致。李研淑在書中介紹了原東京大學校長矢內原忠雄(1893—1961)的見解。矢內原認為法國的殖民地同化政策,有其正當的根據和傑出的哲學背景,這就是以人類解放的思想為特色的啟蒙主義哲學和法國大革命。矢內原認為,如果說日本的“皇民化政策”的來源,是“對日本國民精神之優越的信念”,那麼法國同化政策的基礎則是“法國所有的基于自然法的人生觀”(李研淑,第248頁)。對矢內原的這個觀點,李研淑表示贊同。

所謂“自然法”的概念,是在古代羅馬時期確立的,它不拘于個別地區或者民族的獨特的習慣或者約定俗成,在廣闊的全羅馬帝國實施不分國境的、適用於每個人的判斷善惡的標準並據此量刑。當然因為這種觀念僅限于羅馬地區,因此有它的局限性,但還是對日後各國所制定的法律和國際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而所謂“基于自然法的人生觀”,則是建立在這種自然法之上的,不以局部地區的視點,而以世界的、普遍的視點出發的人生觀。矢內原認為,與日本不同,法國的殖民主義是建立在這種帶有普遍價值的人生觀、倫理觀之上的。但是這種人生觀,自然也不可能避免歐洲這個地域所持有的偏見,比如基督教的偏見。因此矢內原的判斷,對歐洲未免顯得太過寬容。其實即便在這裏面,也還包含有將歐洲內部的利權之爭正當化的因素。然而撇開“自然法”實際上有着歷史上和地域上的限界這一點不說,就憑藉“對其國民精神之優越的信念”而將殖民主義正當化這個說法,實際上和法國的殖民主義理論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而且即使在當今的法國,這種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自以為是的理論也已經受到了嚴厲的批判。

法國也曾經同樣向國內外彰顯它建立在高度的人性與普遍的理性基礎上的獨特的文學形象,從而不僅強化了國民的國家意識,同時同樣以其優秀的文學之名義,將其對阿爾及利亞和其他國家的殖民侵略正當化。也就是說,具有高度文化水準的對外形象,為侵略與榨取提供了根據,掩蓋了其赤裸裸的軍事力量。不過日本在吞併朝鮮的時期裏,因為對本國文化的過度陶醉,似乎並沒有意識到文學對外部所起到的這種意識形態領域的效果。

另一方面,對在發達國家霸權主義壓制下的那些國家和民族來說,對外傳播彰顯自己的文化形象,同樣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因為他們面對強國,不僅需要通過軍事力量和

防衛力量直接加以抵抗,而且還必須充分顯示自己的國家和文化具有獨特的和高度的價值。在這種時候,民族主義所重視的,仍然首先集中到文學方面,這雖然看上去有點像在繞遠道。針對強國所謂的“你們的文化或者道德水準太低,需要我們教導幫助”這種理論,擡出自己國家所擁有的優秀的文學來對抗,從而將對方那種居高臨下的傲慢目光激擋回去。德國和日本就是將自己從第二種的“回應”種群躍居到第一種的“居高臨下”種群的最好例子。

明治以後的日本爲了改正與西方列強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不僅努力發展近代工業,強化軍事力量,而且在都市計劃和服裝習俗等各個方面,都力圖達到即使以西方的眼光來看也有相當高度的文化水準。而形成這個巨大潮流的中心部分的,是確立標準日語(這與言文一致運動也相關聯),和在文學創作以及教育研究領域的民族主義的動向。而這種動向最顯著的表現,就是試圖創造出獨特而且純粹的“國文學”史的做法。

其實同樣的嘗試早在江戶時代就能看到,那時的國學家倡導“純化運動”,排斥“からごころ”(漢心)和佛教的傳統,不過那時人們試圖去尋訪純粹日本的東西,他們認爲那在古代的日本應該曾經存在過,因此是一種追本溯源的探究。與此相對,明治時期的日本所發生的,却與其傳統毫無關係,只是設定一個全新的條件和價值基準,也就是說,文學必須是由日本固有的語言所書寫,這樣改寫出來的日本文學史,自然突如其來地顯現出了一個全新的日本文學的形象。因爲在那之前,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史的回顧研究,具有官方地位的漢詩漢文一向具有最顯赫的地位,反之以日語書寫的《源氏物語》(11世紀初期)、謠曲和俳句之類,則被擠到了下面一檔的個人空間裏了。

但是說到底漢詩文還是屬於“外語”文學,在通過以純粹的、固有的日本文學來發揮日本這個近代國家的“國威”,提高對外“形象”這種面子工程上,做不出什麼貢獻。因此價值突然發生了逆轉,日本最早的和歌集《萬葉集》(8世紀末)、最早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松尾芭蕉(1644—1694)的俳句和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4)的戲劇(木偶戲與歌舞伎),都作爲國民文學的傑作,在公共領域,也就是教育領域得到了公認。有意思的是,基於同樣的理由,江戶中期以來長期被埋沒的浮世草子(類似小說)的作者井原西鶴(1642—1693),也被淡島寒月(1859—1926)、幸田露伴(1867—1947)等人“發掘”出來,搖身一變加入了大作家的行列。

就這樣,向來構成文學中心的漢詩文被排除,一個不含外來雜質的、高純度的日本文學史被重新構築起來,而且這個公認的形象通過課堂傳播到全國各地,並彰顯給西方與近鄰各國。其結果,《源氏物語》通過亞瑟·威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出色的

翻譯(1925—1933)獲得了傑作的聲譽,歌舞伎和能劇也得到了來自西方人的讚賞。通過民族主義完成的形象更新,對外效果顯著,反過來也增強了日本人的自信。

但是顯然,這並非是自然自發地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的結果,說到底仍然是一種做給強者看的“面子工程”。實際上這種對本國語言的執着,和18世紀末以來西方各國十分關注的“國民文學”史的再構築如出一轍,他們將拉丁語文學等所有“外來分子”統統掃除出去,僅僅將本國語言書寫的文學編進本國的文學史中。因此日本人接受了這種從西方舶來的價值取向,又根據這種視點重新審視本國的過去,其結果就是由日本自己的語言所構築的“國民文學”,在教育和研究的兩面,爲了有別于漢詩文,被稱成了“國文學”。

同樣可以說,在語言方面也是在同樣的外來壓迫下“要面子”的心理在起作用。正如李研淑所述,雖然中國的漢字和漢語向來是官方的和權威的象徵,但是“開國”的領袖們爲了確立與近代國家相稱的日本的“國語”,將其視作外來的不純的要素而加以輕視,但同時又僅僅根據“合理”這麼一個奇妙的理由,推獎使用西方的拉丁字母,而不是日本的假名。他們還主張在夾雜着拉丁字母的日語文章中,西方的專門術語和專有名詞之類不需要經過翻譯,可以原文照搬,甚至主張英語教育應該比日語優先的也大有人在。雖然在“外來”這一點上,西方語言比起漢語來要異樣得多,但不知爲什麼並沒有和日本的民族主義發生抵觸。

其實在日本文學史上,學習和創作漢詩文的高潮,恰恰發生在明治時代,在當時的政治家和軍人中間,有不少優秀的漢詩作家。漢字雖然不再像以前那樣受重視,但並沒有被徹底排除。推獎拉丁字的運動,也很幸運的,並沒有紮下根來。從中可以明確地看出,明治時代試圖創造“國文學”與“國語”的努力,都不過是迫于外壓,由上而下進行的改革而已。

將來自中國的東西作爲不純之物加以排斥,但只要是西方的,即便是舶來品也高高興興地接受,這顯然很矛盾。當然這並不僅僅只是出于方便和合理,說到底是出自只要不是從“後進的”中國,而是從“先進的”西方拿來的,就不會被西方人討厭的心理在起作用。當然這也是一種民族主義,但這種民族主義並不是一般所想象的,將傳統主義的國粹的日本文化加以純化的運動,而僅僅是一種面對西方的喬裝改扮而已。據李研淑研究,在制定“標準語”時,是以現在我們所說的東京的口語爲基準的,而這個選擇依據,則來自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等西方最先端的語言學家的理論,而這也是日後的語言學大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理論的一個源

頭(李研淑,第3—12頁,第179頁)。

特別是在文學方面,雖然名稱是“國文學”,但是在教育的必讀書目的選定、研究評價的方法等各個層面,都是將當時,也就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在歐洲占支配地位的文學上的思想體系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的。

當時的歐洲正是現實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時代,在文學形式上則是小說的極盛時代。因此,日本對“小說家”井原西鶴的重新發現,和對《源氏物語》的重新評價,理由都是這些都是現實主義小說的傑作,並且是我們“日本也有的”,而替代了向來最受尊重的、最早的敕撰和歌集《古今集》(905);反過來《萬葉集》和芭蕉、與謝蕪村(1716—1783)的俳句得到極高評價,也是基於廣義上的現實主義理論。也就是說,被認定為“最日本”的那些東西,其實都是通過“西方的眼光”被甄選出來的。至於被西方人“重新發現”的浮世繪和陶瓷器之類,就更加無須贅言了。

而坪内逍遙(1859—1935)在《小說神髓》(1885—1886)裏,替代向來的勸善懲惡主題的故事書,作為今後應該創作的日本新小說的範本所提出來的,其實是英國的寫實小說。坪内主張“小說重在人情,世態風俗其次”(坪内,第42頁)。在那之後法國的自然主義又作為日本文學的標杆而得到積極汲取,並因此產生了日本式的描繪個人心境的“私小說”。此外正岡子規(1867—1902)在創作新型的俳句和短歌時倡導的指導原理,則是源自西方繪畫的“寫生”的概念。當然在教育和研究領域,從現實主義和實證主義這兩個方面來考察文學的方法也一直占支配地位。所有這一切,可以說都是以當時的西方人的目光來審視日本文學的結果吧。

那麼在21世紀的現在,當我們不再需要那麼強烈地去意識對國家的獨立構成威脅的來自西方的目光時,“國語”和“國文學”的教育和研究的現狀又如何呢?很遺憾,政治上的獨立並不一定就意味着文化上的獨立。即使是今天,無論是作為教材被甄選出來的那些名著目錄,還是有關這些名著的解讀方法和評價基準,都和明治時期那種僵化狀態沒有什麼兩樣。明治民族主義的遺產,一直殘留至今。充當主流的思想體系,仍然是現實主義與實證主義(即偏重傳記性的歷史性的事實)。在文章解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方法一成不變,即搜尋“作者的意圖”,並判定出唯一的“正確”答案。在一篇文章裏,一定會有作者有意注進的,而且是唯一“正確的”意圖,這種想法真可謂“近代”的武斷。

這種現象的最好例證,可以舉出一直遭受批評却毫不見改進的高中和大學的語文入學考試問題。清水義範的暢銷書《國語入學考試問題必勝法》(1987)就是諷刺這種